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一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五期 ——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0707b)

---

【回首文革】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节选二） 徐景贤  
【奇闻轶事】文革中的特工奇人——游雪涛 青近军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回首文革】

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节选二）

• 徐景贤 •

◇ 张春桥奉召飞往北京

我们几个人，王少庸、马天水、我、王承龙都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天，张春桥很特别，特意叫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显得镇定沉着。他看见我们很着急，就对我们笑了笑，让我们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定的样子，觉得他总有什么底，也放心不少。我们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给姚文元打下电话。

姚文元非常吃惊；说：“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十五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我感到姚文元对这事很重视、我脑子里一转为什么找李作鹏呢？

第一，因为这里涉及到保邱会作还是反邱会作的问题，找邱会作不方便，第二，前两天张春桥大会讲话的时候，把余立金错说成吴法宪，把吴法宪也扯进来，所以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可以找他。我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定了。但我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是不是向毛主席、中央正式报告此事。我知道，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我出面比较方便，所以我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感觉到我的考虑还是挺周到的。

我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我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主席。电报发好后，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他们商量要反击。我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有一条意见比较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王洪文告诉我：“‘工总司’内部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我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张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我对王洪文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那天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我很清楚，这肯定是我们给中央发的电报以及姚文元向江青汇报的结果。张春桥临走前，要我们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张春桥走后，我乘车到外面兜，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部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学生很多，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部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红圈圈，打着大叉叉。具名是“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我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兜到南京路，慢慢走不动了，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议论的、看标语的、贴标语的，一片乱哄哄。车辆被堵在那里，排成长队。到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我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人家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出后好奇，看后排坐着什么人，一个人叫起来：“徐景贤！徐景贤！”一叫，大家都想看看徐景贤跑到这里干什么，便都围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我装得很严肃，不流露出任何情绪化的东西，但是我很尴尬：人家在炮打张春桥，我在南京路上做什么，十分引人注目，好像在凑热闹。后来警卫员对司机说：“无论如何要冲出去。”驾驶员拼命掀喇叭，整整用了十几分钟，才冲出一段，后来警察来了，把人排开，我才冲出“重围”。

回到康平路办公室，临近下班时，东海舰队送来一份电话纪录，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电话指示先传到东海舰队，东海舰队再给我们传来。很多书上写着，那天吴法宪乘飞机到上海，传来四条指示，没有这回事，吴法宪在这事里没有出现过。

除了李作鹏的三条指示，我也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接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军宣队负责人是方耀华，因为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我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这时，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上海政宣系统群众思想非常混乱，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主张炮打。政宣系统分成两派，反对炮打的一派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辩论，我一听，既然李作鹏和空军的指示都来了，我手里有了王牌，政宣系统要搞辩论，我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我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那天晚上，在外滩市革会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我、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但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而且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当天我主持会议，宣布辩论会开始。

朱锡琪那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部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

其他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著，朱锡琪站出来发言了。他说话咄咄逼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我一听他还在继续煽动群众，非常生气，因为有李作鹏电话指示的底，我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部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春桥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电话指示，所以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

这时候，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清嗓子，他是长征老红军，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纪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一遍还不够，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高志荣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接着，马天水发言，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他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我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进一步发挥：“朱锡琪等人同一九六七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朱锡琪在下面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大家都叫：“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这时候，朱锡琪没有表态。《文汇报》三个造反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我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统还要回去传达，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琪。

如此一来，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我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我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不能再让朱锡琪负责，我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较好，平时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文字比较好，我曾把他调到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参与起草“九大”章的草案，同时在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专门编写过简报。这样，我们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的错误。邵传烈跟我们讲他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从北京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表示忏悔，流着泪向我们检讨，承认错误。我们当场要他把《文汇报》的编辑担子挑起来。但是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以后，《文汇报》每天版面的定稿情况他都用红机子打电话向我汇报，请示得非常频繁。

最使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在市革命委员会要害部门出了“动摇分子”。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个人给王承龙看中，王承龙让他掌管市革会组织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王承龙还提名有些人做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谁知道，这个组织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桥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获，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漏，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这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后，我们非常生气，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承龙有苦说不出。王洪文与我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箱，不然，那里要是再看，怎么得了？这样，我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进入档案室，指令组织组工作员打开一个个铁柜，看到《张春桥档案简本》和《姚文元档案简本》，我也很紧张、不敢打开看，我说：“赶快把它封起来。”这样，好几个工作人员把这两个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都捆起来，然后用封条封好，由我和朱玉佩两人监督，押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王少庸叫人当着我们的面把档案放进他的保险柜里封起来，免得以后有人从中收集炮打的材料。

接着，王洪文对我说：“市革会组织部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

实际上，王洪文觉得他掌管的部门比较少，组织人事大权很重要，他认为抓权的机会来了。他说：“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我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我在那一刻是支持王洪文的，我说：“你派人进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我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同意了。王承龙吃了一记闷棍。这样，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三十多岁，曾在车间担任工段长，造反以后，曾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祖敏为人谨慎，不像王洪文别的小兄弟在外面冲冲杀杀，犟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王少庸也接受。我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接着，我们在上海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我在延安西路二〇〇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那天，我还耸人听闻地用历史来对比，我说“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一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这样，我把两个“四·一二”相提并论来加以批判。

另外，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上，我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在讲话中对张春桥歌功颂德：“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派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我当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表现，有没有错误言论，来势非常凶猛。市委监察委员会有个工作人员，在“四·一二”时，议论过张春桥的历史，现在要追查，他很害怕，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海格大楼七楼跳下，当场身亡。这也是在“四·一二”整风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人。

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稳固了，但是我们听说，复旦大学有一部分学生还不服气，这个单位还没有稳住。

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和我、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我们还把在这次反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虽然名义上是开座谈会，但是所有领导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大家都批判所谓的炮打逆流，为张春桥唱赞歌，把复旦大学炮打的声势全部压了下去。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炮打。我们说：“参加炮打的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我们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

◇ 毛泽东说：“无事。”

我们把上海清查“四·一二”炮打的情况，每天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书面的，口头的都有，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里面有“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口号。

正当我们在上海很起劲地追查的时候，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主动问：“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我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讨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做检查的罗？”

我对他的话摸不着头脑，回答说：“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查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我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其实我自己也扭不过来，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为难之处，他劝我说：“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我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那天接了电话以后，究竟怎么回事，我确实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我一直是坚决执行的。

第二天晚上，我根据张春桥指示，到《文汇报》去召开大会，因为前面我们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怕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查不满意，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他是部队干部，对地方造反那一套很不习惯，上级命令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的检查表示欢迎，他发愁地说：“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我先说了一段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

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下面的人一愣，从市革会大厅大会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叫过朱锡琪一声“同志”、大家感到我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朱锡琪那天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他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一遍，应该说，检查还比较深刻，有进步。他刚刚讲完，人还没有离开扩音器，我就带头鼓起掌来，这真叫“孤掌难鸣”，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肯发出声音。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我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务。接着我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那天，朱锡琪也感动得流泪。《文汇报》有些人，本来确实觉得脸上无光，因为整朱锡琪，把《文汇报》也整得够呛，这样一来，《文汇报》的工作也正常起来。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活动暂时停息下来。

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把王少庸、马天水、我、王洪文等比较核心的领导找到兴国路招待所。那天，他穿着军装，显得很精神。他坐在藤椅里，一面抽烟，一面跟我们讲话。张春桥喜欢抽没有过滤嘴的中华牌烟，他嫌带过滤嘴的烟抽起来没劲，香烟把他的手熏得焦黄焦黄。他喷出一口烟，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张春桥说到这里，显得非常感动的样子，我们几个一听，也被感动了；说明毛主席对张春桥是十分信任、十分关心的。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听了这段传达，我们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所以张春桥要我们来个急转弯。我和王洪文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会心地笑了，说明毛主席高明啊。张春桥那天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非常不满意，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我们回来后马上要游雪涛把它销毁。游雪涛本想做一件邀功的事情，结果吃了一个批评。看起来，“四·一二”炮打的追查工作似乎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张春桥后来多次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他多次提到炮打的背景有很多疑点可以查，我们也都觉得这些问题没有查清楚，都是隐患。所以到一九七〇年，全国、全市范围都搞清查运动时，王洪文提出全市要清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大事件，把一九六七年“一·二八”炮打和一九六八年“四·一二”炮打列为其中重点清查的两大事件。清查十大事件得到张春桥的正式批准。

我想：一九六七年炮打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又说“无事”。我认为“无事”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炮打张春桥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应该把它查清楚。这样，我们通过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把原来一批已分配到外地工作的“红革会”头头，重调回上海，给他们办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最后把“红革会”原负责人马立新（复旦大学“红革会”）、李功佐（上海师院“红革会”）、劳元一（复旦大学“红革会”）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把他们重新分配到外地。“四·一二”炮打后，朱锡琪已经在做一般的编辑工作，他听了传达，十大事件中有一个是关于他的，很害怕，逃走了。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好几天，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回来。清查时，不光查朱锡琪，还查周国荣，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曾给上

海传来几个重要信息，在“四·一二”炮打后负责人艾玲给中央文革写过检讨，陈伯达看了以后，批了两个字：“很好”。还说艾玲写了一个又长又好的报告，陈伯达表扬了，张春桥就没话讲了，当时就没有整艾玲。后来艾玲调回上海，在朱锡琪下台后，做过《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清查时，发现艾玲与林彪下面的王维国那些人接近，张春桥采取措施对艾玲隔离审查，对《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全体成员也审查，打击面很大，有关艾玲的详细审查情况我在后面专门说。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几个人，统统被弄到上海，关在上海民兵指挥部，罪名是炮打的时候办事处给上海传回怀疑张春桥的材料，每个人都被审查，有的是资格很老的报人，有的是一般的编辑、记者，也有的是一般工作人员，如打字员、机要人员。不光这样，当时我们写作班派去北京办事处的朱维铮，与艾玲关系很好，两人无话不谈，议论过江青过去的历史以及在延安的表现，审查艾玲时，把朱维铮也关起来。朱维铮思想不通，关在民兵指挥部的时候，他在里面大声地叫喊，用拳敲、用脚踢铁门，要求把他放出来，没人睬他。查了很久，查不出《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有什么问题，只好把那些人放掉，但艾玲一直被关着。艾玲的消息是从她丈夫贺瑞林那里来的，张春桥就记仇了，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利用他在军队的权力，要总政专门查过贺瑞林。

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两千五百多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办学习班审查、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

#### ◇ 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革命”

“工总司”二兵团的标语刷出以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复旦大学最早造反的学生组织之一“孙悟空”刷出了相反的标语：

坚决反对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币委！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币委第二书记！

“孙悟空”一派的负责人小胡和小周，还到市委党校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办公地点，找我展开辩论。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刷这样的标语？”

小胡回答：“我们造反的目标是打倒上海市委，张春桥原来是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其他书记都有严重问题，难道张春桥就没有问题吗？我们认为现在市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反对现在成立新市委，更反对张春桥等人当新市委的领导！”

至于全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头头们更是想不通他们抢在前面夺了全市的大印，张春桥和姚文元却不支持，现在“二兵团”等提名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的领导，又抢了头功。眼看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重又失去了，他们就把满腔的怒火都倾泻到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加上他们得到情报：其他的学生组织“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简称）、“孙悟空”等正在收集材料，酝酿“炮打”张、姚，他们更加坐不住了。“红革会”总部举行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上海搞一次秘密行动：绑架徐景贤，从徐的身上打开缺口，收集炮打张、姚的材料，同时通过这次“火力侦察”，看看张、姚有什么反应；

#### ◇ 我被“红革会”绑架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多名红卫兵，来到淮



海中路市委党校的三楼会议室、强行对我进行绑架。我挣扎着提山抗议，他们十几个人架着我，从楼梯上住下拖。市委写作班的王知常闻讯赶来，想要抢救我，把我拦腰抱住。那些人就把我和王知常一层楼梯往下推，从三楼一直推到底楼。市委联络站的程绮华、郭仁杰等堵住党校的前门想要拦阻，他们却突然把我转移到党校后门，那里早已停着辆事先准备好的吉普车。我不肯上去，他们就打我的脑袋；硬把我和紧抱着我的王知常一起塞进了车厢，吉普车疾驰而去……

到了复旦大学，他们把王知常拉走了，把我秘密带到了一间有人看守的大会议室关押起来。我乘人不备，撕掉了我身上的记录本和电话簿。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多个头头闯进了大会议室，他们坐在十多把折椅上、把我团团围在中间，一场半夜审讯开始了。这些平时稔熟得可以随时拍肩膀开玩笑的红卫兵战友们，此刻却个个紧绷着脸。穿草绿色军大衣的小马，首先用浓重的山东话开了腔：

“徐景贤！我们红革会总部今天对你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你要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冷冷一笑：“你们凭什么？”

瘦瘦的长着一副长脸的小劳跳了起来：“你是当权派，我们红卫兵就是有权审讯你！”

“我算什么当权派！”

“你是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你要管历史组、哲学组、文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这么多笔杆子，你又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你这个丁学雷怎么不是当权派？”嘴唇上长着一层茸毛的小劳，不愧是“红革会”二处专搞情报的头子，他得意地笑着，抛出了他早已掌握的关后我的材料。

“你为什么不提我现在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呢？就在几天前，你们还口口声声称我为战友……”

“你们是全民造反！”“市委写作班是假造反！”“你们市委机关总部造反，我们信不过！”好像四五挺机关枪一样，劈劈啪啪一齐响起来。

“那好，我们市委写作班开造反大会，你们‘红革会’为什么要把文化广场的会场让给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你们为什么要到会祝贺？大会开过以后，你们的《红卫战报》为什么要和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合编《大会专刊》？还有，你们说我们是假造反，那末为什么上个星期你们还要拉我们和‘工总司’一起联合夺权？”我也不甘示弱，一连串“迫击炮”轰了回去。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义，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了，张春桥也当过市委书记处书记；抓过思想文化工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们认为：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姚文元现在不能当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都领导过市委写作班，他们和你都应当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山东口音的小马终于把他们的意图亮了出来。

复旦“红革会”勤务组的小谢，方方的脸盘，脚上还上着石膏，腋下正拄着拐杖，他指着我说：“你徐景贤在市委工作了十几年，你最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你是张、姚的‘材料袋’。现在在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老大、老二，你徐景贤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应当站出来揭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嘛！”

“‘徐老三’赶快老实交代!”“‘徐老三’应当马上反戈一击!”一阵喧哗,从此他们直接喊我“徐老三”了。

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我索性以攻为守起来:“你们绑架了我,把我当成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材料袋’,想要从我身上打开缺口,‘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这可是打错了算盘!不错,我了解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也知道他们的不少情况:他们组织和写作了《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揭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们又通过《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端出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你们都知道,这些斗争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这次来上海,也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来的。难道中央文革也可以‘炮打’吗?你们自称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可是你们却干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奉劝你们赶快悬崖勒马!”

他们听了我的话,面面相觑,其中有一个红卫兵又提出了新的质疑:“张春桥和姚文元如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要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

我惊讶地问:“你这话从何说起?”

那个人回答:“刚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派了军队要到我们学校里来搜查,我们已经在市委党校和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展开了大辩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张春桥、姚文元派出持枪的解放军,枪上还上了刺刀,把枪口对准红卫兵小将,强行要进我们学校,这不是镇压学生运动是什么?”

我这才明白过来“哦,你们这是什么逻辑?我们都学习过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中央文件,假如你们不太健忘的话,就在几天以前,‘红革会’总部夺了全市的大印,你们不是也请求上海警备区派军队保护过你们的吗?今天,你们突然袭击,绑架了上海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而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派出战士来寻找我,完全合理合法,这能叫做‘镇压学生运动’吗?”

“‘徐老三’,你别嚣张!”“你这个黑秀才,老的就是一张嘴!”这些红卫兵气得嗷嗷叫,其中有一个人霍地站起来,把面前的折椅踢翻在地。

我一听解放军都在找我了,胆子更壮起来,我索性向他们提出要求“我既然来了,愿意奉陪到底!第一,我要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红革会’总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无故绑架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当面向我道歉!第二,刚才在市委党校,你们绑架我的时候使用暴力拗我的手,上车以前还殴打我的头部,我到现在还觉得头晕头痛,我强烈要求去医院验伤,并且要你们交出打人凶手?!不然我要向全市提出控诉!”

他们果真被我的气势镇慑住了,交头接耳一阵以后,为首的小马宣布说:“我们不跟他多噜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大家到总部去!”说罢,他们呼啸而去。

清晨,看守我的学生从食堂里给我打来了一碗稀饭和一碟酱菜,我刚坐在乒乓桌旁喝着稀饭,“红革会”的头头带了三名人民解放军走了。

进来。其中一名是军官模样的,腰里佩着手枪;另外两名是战士,手里都持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红革会”的头头指着我说“喏,这不是徐景贤吗?他好端端地受到我们的保护哩。”那个军官模样的人朝我注视片刻,认定了我确实是徐景贤,而且看来处境是安全的,便不再说

话，带着战士回身走了。

我估计他们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派出的解放军，前来打听我的下落的。我跟到门口，看守的学生把我挡住了。我从敞开着的门户里朝外望去，只见有人正在校园的围墙上刷大字标语：

张春桥、姚文元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救了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我来说，实在是十分漫长的一天。

自从清晨那几个解放军战士来看望我以后，看守我的学生也换了班，新来的人板着脸不和我讲话。捱到中午以后，还是没有人来找我。

我透过窗外的铁栅栏，看到、听到小鸟在树梢头上跳着、叫着；更反衬出了“囚室”的安静。我知道上海正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对立的双方都围绕着我的被抓争斗着、较量着，而我却好像处在一个“刮风眼”里，感到异常的平静。想着、想着。我感到困倦起来，索性倒在乒乓桌上，一头栽入梦乡……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复旦“红革会”勤务组拄着拐杖的小谢，一跷一跷地来通知我立即转移。他们带着我转移到学生食堂前面第三幢宿舍的二楼，把我藏在一间窗户上装着栅栏的学生宿舍里。

我刚安顿好，忽然看见“红革会”的人带着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进了门。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复旦的红卫兵都很熟悉；那天“红革会”的人到市委党校来，借口要和我讨论上海的形势，就是郭仁杰把我引见给他们的。谁知道“红革会”使出了绑架的一手，郭仁杰觉得很内疚，此刻他见了我，皱着眉头，唉声叹气，把手里拿的毛巾和漱口杯等往我的上铺上一放，瓮声瓮气地说：“老徐，我对不起你；我来陪你一块儿关禁闭。”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问。

“一月二十七号晚上你被抓以后，我马上报告了兴国路，今天打听到你的下落，我就赶来了。”

“市委机关联络站现在正需要人，你怎么能离开？”

“我和复旦的人比较熟悉，所以我对市委联络站的程绮华他们商量过了，我留在这里，假如有人要对你下手的话，我也奉陪到底，”

冬天天色暗得特别早。从窗栅栏望出去，夜幕已经笼罩大地。乘看守的学生大部分去吃饭的机会，郭仁杰悄悄地告诉我：张春桥、姚文元接获他的报告以后，因为我的去向不明，他们很著急，立即通知上海警备区，派出了警备师的四个摩托排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直到二十八日早上有人亲眼看到我是安全的以后，才把部队撤回，“红革会”立刻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张春桥、姚文元派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整整一个下半夜，“红革会”的一些人在市委党校，围住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徐海涛，和他展开大辩论，要他交出幕后指挥者。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张春

桥，姚文元约见“红革会”的负责人谈话，在上海展览馆谈了六个小时，“红革会”坚决不肯让步，围攻张春桥和姚文元，看来他们还有更大的动作。现在“红革会”已经通知各大专院校的基层组织，上街刷“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字报，满街已经贴满了“炮打”的标语。

“工总司”和其他的造反组织，反对“红革会”的做法，准备组织反击，王洪文和耿金章本来在“工总司”各拉自己的一派势力，调动了队伍，打算在南市区一带打“内战”、搞武斗，听说了“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停止“内战”，各自把队伍撤回来。决定联合起来对付“红革会”……张春桥、姚文元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要市委写作班和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电报……

我听了以后，不禁忧心忡忡，因为目前的局势确实比较严重，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

一月二十九日晚饭后，整幢学生宿舍里面的人忽然都离去了，只留下一名看守，看来又有什么活动正在酝酿着。那名看守正好是郭仁杰的学生，姓韩，我和郭仁杰交换了一下眼色，郭仁杰走过去悄悄问他：“小韩，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那个姓韩的学生推了推眼镜说：“晚上全校开誓师大会，你们可以听拉线广播。”

果然，过不多久，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从复旦大礼堂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人红旗，‘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现在开始！”接着、各派红卫兵的代表争先恐后地上台发言。

复旦“红革会”大队部的代表首先介绍了对徐景贤采取“革命行动”的经过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声称这次“火力侦察”取得了成功，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复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在会上分析形势说：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抓“徐老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炮口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提议明天一月三十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有十万红卫兵参加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把“徐老三”拉到大会上去斗；开完大会，全市红卫兵举行“炮打”游行，到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去示威！

听完他们的倡议，会场里呐喊起来：

“对，给徐景贤挂上牌子斗！”

“让‘徐老三’也尝尝戴高帽子的滋味！”

“张春桥、姚文元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罪该万死！”

听到这里，我心急如焚，再也听不下去了，猛然从床上站起来：对郭仁杰说“老郭，无论如何要制止事态的发展。明天我个人安危事小，群众冲突事大。开完大会红卫兵要游行到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的住处去，王洪文和耿金章他们肯定要调动‘工总司’的队伍来保卫，这样，势必发生工人和学生的大武斗、大流血，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

郭仁杰用门牙紧紧地咬着嘴唇，他的脸庞也因为紧张而扭曲了；那个看守我们的姓韩的学生，正好坐在我们的对面，听到我们的话，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我们在宿舍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嘴里不住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把信息带出去！一定要制止这场大流血！”

郭仁杰跨前一步，走到那个学生面前，声音略带颤抖地说：“小韩，我们都是哲学系的。彼此的了解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们……”

那位小韩露出了迟疑不决的神色。我也恳切地说：“小韩，我们过去不认识，你对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决不会对一场流血惨案袖手旁观的，希望你能带我们出去打一个电话……”

小韩用手推了一推眼镜，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说：“走！”

我们三个人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我赶快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的代码，我要何秘书请领导听电话。过了片刻，我听到了张春桥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我急促地告诉他：复旦正在开“炮打”誓师大会，我在一位看守我的学生的帮助下，偷着出来打的电话，明天他们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把我拉去批斗，会后还打算到兴国路一带示威游行，很可能会和工人队伍发生冲突……

我一口气汇报了这些情况，张春桥紧张地听着，嘴里嗯嗯地答应着。最后，我向他请示：“我已经跑出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行动？”“你现在还回得去吗？”张春桥问。

“回得去。他们还在开大会，没有其他人发觉我们”。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终于作出决定：“你还是返回原处，免得他们节外生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顶住。”

“那好，我现在就回去了，再见！”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要坚信中央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个事件的！”张春桥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我们回到关押我们的宿舍，大会还在继续，但是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因为信息已经送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会向中央报告的。明天我可能要挨斗，反正睡不着觉了，看见桌上铺着白报纸，放着墨汁瓶，我和郭仁杰商量，合写一张大字报，谈谈我们的观点。郭仁杰拿起了笔，我在旁边念着，他提笔疾书：

一、为什么在打倒上海市委的关键时刻，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领导，这样的大方向难道是正确的吗？

二、为什么在上海各个造反组织联合夺权的重要关头，有人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不是搞乱我们自己的阵线吗？

三、……

写完以后，加上标题《六问》，我和郭仁杰在大字报后面签上名，并写上“我们现在住在第

x宿舍x楼x室，欢迎大家前来交换意见。”然后把大字报交给小韩，请他下班以后，帮我们把大字报贴到校园里去。一会儿，大会散了，“红革会”的头头们和看守的红卫兵们都拥了进来，瞧我们没有什么动静，就放心了。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在一边写起大标语来。

我也开始闭目养神，我想：“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哪！”我解下围巾蒙住眼睛，遮住刺眼的灯光，侧身向壁，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寝室里一片静谧，红卫兵们也已上床就寝、忽然，从复旦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发出的广播声，把大家都惊醒了：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我马上抽身坐起，心脏激烈地跳动着，我意识到这个特急电报肯定是和“炮打”事件以及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校园里很安静，女广播具的声音一字一句，十分清晰，我们都屏息静听：

####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广播刚完，寝室房门“砰”的一下给外面的人踢开了，有人高喊着：“紧急集合！快，紧急集合！”双人铺上的红卫兵们一阵风似地奔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郭仁杰两个人。那些没有写完的大字标语，飞满了一地。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的清晨五点钟。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来得正及

时，把我从厄运中救了出来！

#### ◇ 张春桥姚文元锦江被“绑架”

一九六七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幕详情，外界鲜有人知。

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先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接见了我和联络站的成员，并且宣布市委联络站就是他们的工作机构，日常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至于一些重要的活动，他们安排在茂名南路锦江饭店进行。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八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

谁知道，锦江饭店早已不是安宁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职工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卢湾区指挥部（简称“卢指”）挂上了钩，在饭店内的名称是“革联会”。

锦江“革联会”的少数头头，在“造反”之风的煽动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就在锦江饭店里制造过“停电事件”，影响很坏。之后，他们又挟持饭店的负责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来总理接见，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什么“革命行动”，结果当然没有达到目的。

这些人返回上海以后，开始酝酿夺权，所以急于为自己的组织制造舆论。他们得知张春桥和姚文元此刻来到锦江饭店，正中下怀，想乘机要求张、姚接见，以便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 ◇ “革联会”电梯“逼宫”

“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下到二十岁，原来是锦江饭店门房间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八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

张、姚正忙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们答应接见。

过了几个钟点，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八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入停在八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青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九楼，电梯门“咔嚓”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

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叫开

电梯的老周靠边，由他们一派掌握开关。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住下开，而是往上开到九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要张、姚同意接见。

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

“我们已经在九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

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

“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

“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

“我们今天回去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

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

“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

“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他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

“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员大老李示意。

“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

“当……”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脸孔涨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

“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



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笃笃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

“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

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

“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

“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张、姚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另一个警卫员气得想要拔出枪来，张春桥怕吃眼前亏，使用眼光制止了。双方僵持不下。张、姚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怕事情闹大了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终于从瓷器大花瓶里取出钥匙，开动电梯送走了张、姚……

#### ◇ 张春桥“秋后算账”

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刚到上海才几天，就尝了这么一个“下马威”，“中央文革”要员的威风扫地，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他们赶紧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查、整顿。张春桥还专门关照：

“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要特别注意。”

张春桥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担当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进一步揪出在背后进行挑动的“走资派”。

我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指派和我在市委写作班一起“造反”的亲信朱某，带了一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锦江饭店，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为首的调查组在锦江饭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当场点了“革联会”头头汤某等人的名，并根据张春桥谈话的“口径”，指出当时已参加工作的锦江饭店总支副书记赵某，就是“躲在背后的长胡子的人”，也是这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首长”的“电梯事件”的“后台”。

过了一年多，张、姚仍然不能忘怀这次电梯“受辱”事件，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说：“真是怪事，胆大妄为，对‘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么’造反派‘？’”张春桥说：“说得不客气一些，性质完全是绑架，背后长胡子的人还没有查清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实现了全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就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开讲了锦江饭店的“电梯事件”，并且声称“我看锦江饭店有坏人！”下令彻底清查。

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面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

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足足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患了严重的肺病，

差点送掉性命。他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迟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 【文革轶事】

### 文革中的特工奇人——游雪涛

• 青近军 •

游雪涛曾是个青年记者，也是个文革造反派。但是，让他进入历史的，不是他生花的文章，也不是他狂热的造反行为，而是因他自个儿自发搞出来的特务活动。而且，他的轨迹，也似乎是历史上某个幽灵的再现。

1927年秋，某日，在刚刚宣布下野的蒋介石于上海拉都路20号的府邸大门口，毕挺挺地站立着一个30来岁的青年军人，似乎是蒋府的卫士。他在这儿已连续站守了三天，每日上午准时来，傍晚才离开。然而，这个站岗的青年，却并非蒋介石的什么警卫，而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营的一个陆军中士，此时，他到蒋府大门来值勤，则更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其目的，就是希图能让蒋介石见到他，从而能使他直接投靠蒋校长。

三天的辛苦却未换来面谒蒋的机会，但有幸被蒋的随从主官胡靖安赏识。于是，胡便向这位陆军中士布置了一个任务：利用其与同学、同乡、朋友往来的机会，为蒋搜集情报，以使蒋能尽快东山再起。但是，任务之初却完全只能是业余性质，既无经费发给，也不能对外号称是蒋的人。任务不轻，条件却近于零。

也不知是不是胡靖安原本只是为打发敷衍，而才这么说的。对此，换了他人，十个有九个半都没人会干，会想：你当我是傻子啊！然而，这位青年士官却高高兴兴地做了，当然，起初也的确做得异常艰辛，而且还得经常自掏腰包充作经费。但是，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这个陆军中士居然竟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了一段段让国人不能不对其刮目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且他本人也成了无数国人知晓的一大名人——不论是痛恨他，还是喜欢他——几十年来，直至现在。自然，当年的陆军中士，后来去世前的军衔，早已晋为国军的少将，而且是特殊意义的将军衔。这个人，就是戴笠，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创立人与首脑。

戴笠的故事，知道的人是非常多的，真真假假的都有。但，不论真假，人们也就是将其视为一段历史，一个历史人物而已；相信，没有几个人会细细研究他。

然而，戴笠摔死了的21年后，在上海，有一个青年人，却让他还了一阵魂。这个青年人显然是曾熟读过戴笠的发迹经历，并且似乎也有了类似戴某人初始行事之动机与打算，而且，他还真的进行了诸多实践；居然，他也干出了一些令人惊骇的名堂，最终也让他与他的行动班子——“扫雷纵队”与“244小组”，进入了当代历史画页。虽然，这个青年人后来为此，也要付出18年的监狱与劳改生涯。

这个人，就是上海文革中的所谓“扫雷纵队”与“244小组”的头头，名叫游雪涛。

“扫雷纵队”与“244小组”是个什么机构呢？是一个专为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及上海市

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搜集情报的、造反派方面的特务团体。

文革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是由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一场公开的路线斗争，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进行公开的活动，为何上海的造反派却搞出这么一个进行地下活动的特务机构来了呢？

虽说，当时，在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中，确实都有过一种如“动态组”之类的机构，但这种“动态组”的任务与目的，却只是关注搜集了解整理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文革发展情况，然后简要提供给本组织的头头们参考，以使自己的组织不致于在造反运动中犯下方向性错误。而搜集情况的手段，也主要限于从大字报、传单及人员互相通报等几近公开的方式，只是搜集整理的情况，比一般人了解的要专业些、细致些而已。

然而，游雪涛搞的这个“扫雷纵队”与“244小组”，却远不是做这些名堂，而的的确确有了“军统局”的味儿，的的确确是在进行专业的特务工作，是为张春桥在上海顺利执政而予以清除隐患的“扫雷”式地下活动。

因此，这个“扫雷纵队”及“244小组”，确是文革中一件鲜有罕见的奇事。

而更奇的是，这件事及其特务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竟全是游雪涛一个人首先主动自发搞起来的。或者说，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利用文革的机会，居然真的做了一回戴笠梦！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生于1935年，文革时31岁，他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他的家庭很贫苦，母亲28岁时便成了寡妇，靠她一个人做工养活了游雪涛几兄妹。游雪涛16岁进工厂，21岁时入了党，他凭自己在工厂里业余刻苦学的文化，养成了爱读书、写文章的习惯，还特爱写诗（这个爱写诗的特点，常常会让人变得浪漫，异想天开）。因为喜欢给报社投稿，最终让报社看中，使他由工人变成了上海团市委《青年报》的记者、编辑。

文革开始后，游雪涛在《青年报》社内也成了一个造反派。但是，不象其他参加造反的人们那样，游雪涛造反后的目标却不在什么“走资派”，不在《青年报》的上级即团市委，而是自个儿悄悄地物色了一些同样对特别活动有兴趣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名叫“扫雷纵队”的地下机构，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

游雪涛的第一份情报，是1966年10月间几经辗转而送到张春桥的案头的。这份以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的信件，其内容是向张反映上海话剧团某著名女演员因造反而受单位打击的情况。当时，张进入中央文革后，正欲在上海找一些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基层干部与群众之典型，以证明中央文革掀起造反浪潮的必要。因此，游雪涛的信及游雪涛这个人，便在张春桥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7年元月四日，张春桥与姚文元悄悄到了上海，支持与指挥上海的造反活动。有一天，游雪涛找到了市委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徐景贤，请他向张、姚转送二份打印的《扫雷简报》。其内容是反映当时上海的“走资派”们如何在随便向造反群众签字发钱、刮经济主义的情况。除了这简报，还附有一些有关情况的照片与签字条实物等。徐景贤看了这《扫雷简报》后，很为惊异，发现这些材料与游雪涛这个人都不简单。当游雪涛告知徐，这简报就是他的“扫雷纵队”办的，而且是打算专门只为张、姚二位中央首长提供服务，当然，从此以后，《扫雷简报》将印三份，之中有一份便是送给徐参阅。游雪涛还告诉徐，他的“扫雷纵队”，其宗旨，就是“要扫除无产阶级司令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雷”。其成员通过以普通群众的身份，能方便地进入任何群众活动大小场合，甚至，其成员还会奉他的指令，打入参加任何需要了解情况的组织与团

体内部，方便地暗暗搜集一切可能有价值的情报，包括上海“工总司”在内的所有红卫兵与造反群众组织内部的情况，而又绝不会为他人知道。

徐景贤虽总感到这方法有点不光明，但搜来的情报确又还不错，便默认了游的活动，并指定专人负责与游联系，并且，也将《扫雷简报》转呈了给张、姚。

姚文元看了一些《扫雷简报》后，很惊异，问徐景贤：这是个什么人？他的材料是从哪儿弄来的？很奇怪，甚至人家的私房话、秘密话都有。

徐向张、姚告知了游的身份后说，有些材料是游派人伪装身份，采取打进去的方法弄来的。

姚听了，便有些不大赞成此作法的意思，说：这么做，恐怕值得考虑一下。

但是，张春桥却相反，他说：游雪涛这个人我知道，他们‘扫雷’组织的简报，我也看了，虽说水份有不少，但之中，也确有些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

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扫雷简报》后，便记起了这个人，同时，也认为游的作法，对他在上海全面站稳脚跟、进而以上海为堡垒影响全国的打算，确有帮助。因为，当时上海公检法系统也乱成一锅粥，又再没有人能帮助他及时了解上海文革运动深层次全方位的动态，所以，他深感很需要一个有效率的耳目队伍。

随后，张春桥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的情况，知道游是出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的共产党员后，他决定使用游雪涛了。

当然，张春桥也要徐景贤叮嘱游雪涛：要小心谨慎，你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来搞你的特务活动的。

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便决定更要放手大干。

他将“扫雷纵队”从家里搬出，迁到市委机关接待处在湖南路一处办公洋房内，并且扩充了人员，并配备了汽车、通讯等器材，搜集情报的手段，也有了发展。在成员扩充方面，游雪涛的能量很大，除在他熟悉的文艺界物色了大批情报员外（他妻子吴锡敏是与祝希娟很要好的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他的触角也伸向了各行各业，包括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甚至连王洪文的“工总司”内，他都发展了成员。一个叫岑麒麟的某军工厂技术员，还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居然也做了游雪涛的特工。结果，“工总司”高层的大小秘密会议内容，都通过游雪涛送到了张春桥的手中，使张对掌控“工总司”有了了如指掌的强力筹码。

但是，此时，“扫雷纵队”仍属自发性团体，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而完全凭其成员自行解决。“扫雷纵队”的成员们之所以愿意跟着游雪涛这样做，除了他们都是些有冒险精神且狂热性格的人之外，当时文革造反的风潮形势允许，以及为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工作的说法，无疑会使他们深觉荣幸；同时，特工活动的神秘感，相信也是吸引他们忠心卖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随着公安机关逐渐恢复正常工作，社会秩序也慢慢趋于稳定。张春桥考虑到游雪涛那套若继续搞下去，是不适宜了。于是，便通过已是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将游雪涛正式公开收编，任命他为相当于市级副部长地位的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并嘱其解散“扫雷纵队”，其成员或回原单位，或另行安排，有些也可以吸收到群运组工作。

这，也算是张春桥对游雪涛前段特工活动的奖励。

然而，玩特工已玩出了瘾的游雪涛，却不想就此罢手，他还想在这游戏中继续干下去；同时，想来也舍不得他费尽心机组织起来的“扫雷纵队”那班弟兄们，就此分手。于是，已拥有市革委会群运副组长高级干部身份的他，想尽办法，居然又成功地仍将他的特工队伍成建制的转到了市革委会办公厅（即在康平路的所谓“康办”），还得到了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时在市革委联络组）的支持，并由“康办”为他们新建了一个基地：徐汇区永福路244号花园洋房。自此，“扫雷纵队”便成为了人们所说的“244小组”，工作性质没变，然而，组织的“民办”自发身份，则正式升为了“官办”规格，活动的手段与条件，也更优越更有力量了，配备了录音设备等特务器材与枪支武器，经费也得到了保证，甚至凭白纸条也可以报销费用了。

对此，张春桥显然又默认了。也许他想，游雪涛毕竟是为他在服务，况且，过去的事实已证明，游的特工情报班子，的确有些办事效率；现在游又已是市革委会部门头头，有合法的官方身份，那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吧。

游雪涛的“244小组”，在其二年多的活动期间，共编送了《动态》、《动态增刊》及其他手写的情报有三百多（期）件。之中，张春桥亲自在上面批过字的就有54件。有时张还会就情报中的某个问题，再另行召见游雪涛，予以询问。无疑，张对游的活动仍是很为重视的。

游雪涛的情报，即那些《简报》、《动态》之类，并不是上海的随便什么头头就能看的，他只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极少几个人。有的，则只送张春桥一人。而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却始终被游雪涛排除在送阅情报的人员名单之外。游雪涛心目中只有张、姚，并没将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视为稳定靠山，相反，王本人及“工总司”还是他经常搞侦察的对象。对此，王洪文在风闻游雪涛的一些活动后，特别是听说“工总司”高层的一些情况，是被游雪涛小组刺探出去的后，更为恼火，欲予追查却又碍于张、姚而不能。

1968年11月30日，游雪涛就“244小组”的活动，写了一份报送张春桥的文稿《一年工作总结》。之中，游雪涛写道：“一个非正式的机构，二十几个没有身份的小小老百姓，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引起别人的无意猜疑与有意诽谤。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间接摸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象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从1967年八月到1968年九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实际上“244小组”，除在编人员外，还有很多外围人员，都在由游雪涛指挥而进行特务活动。

张春桥在这份《一年工作总结》上，批了两句话：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你们的经验，我还要想一想。”

一方面，他的确认为游雪涛小组于他有功；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游雪涛的这种明摆摆的特工活动，会不会给他带来恶果？

游雪涛的特工活动，主要有：监控所谓走资派即老干部们的活动；侦察一切反中央文革及反张、姚的言行活动；掌控上海各主要群众组织内部的情况；联络江苏、浙江的主要造反派组

织。其特工方法，除了侦察、调查、审讯之类外，有时，也使用了暗中绑架的手段。

期间，游雪涛搞了几个耸人听闻的“黑线人物图系”。如什么“老人串连会”，他说，长江以南的苏浙沪皖鲁五省市，存在有一个由十人小组领导的“老人串连会”，后台可能是陈丕显，他们随时有用反革命武装来进行反对文革的可能。游雪涛据此还画了诸如“（江苏）苏字动态一号，反革命地下武装关系图”，用蜘蛛网般的线条，将各地很多老干部都串在了这张图中。凡处在这类图中的老干部到上海来，便全被游雪涛派人布控监视、跟踪，看他们与上海什么人联系。当然，最后这都属于虚乌有的事。

游雪涛还搞了一份“华东黑线人物图”，将华东局九十多个老干部名列图中，谁与谁是什么关系，又与上面谁、下面谁有何种关系，全标注在图中，象《红楼梦》中的几大家族图一样，让张春桥等人一看就明白。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手段，经常对这图上的人物实行监控。

有次，叶剑英到上海来，见了一些昆曲演员，游雪涛马上派人演员中的特工，找那些见过叶剑英的演员，详详细细地打听了解叶与他们讲了些什么，然后，整理成材料，迅速上报张春桥。

1967年夏，北京电影学院五个红卫兵到上海，以要编中国电影界路线斗争史为名，到徐家汇图书馆藏书楼，查找三十年代江青的资料，还到处找电影界的老人谈话，以了解三十年代江青做演员时的情况。这事，也让游雪涛知道了，他便派人打进那几个红卫兵的圈子，假作帮他们做事，然后，将红卫兵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整理密报张春桥。随后，按张的指示，将那五个红卫兵全部抓捕，缴了他们所有的调查材料。

上海武斗时，“工总司”欲进攻“联司”前夕，支持“联司”的支联站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如何抵抗“工总司”的事，而游雪涛早就打入支联站的手下特工，则已是支联站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支联站的什么秘密都不复存在，张春桥、王洪文便能成竹在胸地对付与处理他们。

当然，在上海发生的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中，游雪涛与他的特工机构更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张春桥对当时上海的局势及人事态度变化的情况，都有了很为清楚的了解，因而，能从容对待与处理那二件事。由此可见，张春桥在心底里，的确是真正感谢游雪涛小组的。

游雪涛有张春桥的支持，其特工的胆子也越搞越大，胃口也越来越旺，结果，他将手也伸进了军队，对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空四军也搞起了特务活动。他搜集了许世友支持上海警备区原司令员廖政国抵制张春桥的情况；将上海警备区14名师级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排了队列了表；他还将警备区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司令、副政委、后勤部负责人找来，一一了解南京军区的情况。然后，整理了有五万多字的材料，报送张春桥。

只是，游雪涛这次遇了个强手对头——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依仗他与林彪系统的密切关系，不仅不买游雪涛的账，而且，他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活动，也搜集了不少游雪涛搞特工的情况，报送中央军委。这一来，游雪涛的特务生涯终于到头了。

197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虽然林彪军人集团遭受到了失败，但庐山会议前段军方针对张春桥文人集团的风波，还是很让张春桥惊吓了一阵。因此，回上海后，得知游雪涛仍在对军队搞特务活动，便深感这将是件惹麻烦的事。目前情况下，如果王维国等人向中央告状，说他张春桥在搞特务组织，惹得毛泽东对他发脾气，那就会坏大事的。考虑再三，张春桥决定，立即停止游雪涛的特务活动，解散“244小组”，游本人则转调市革委会专案办担任核心领导人。

游雪涛对此没有意见。但是，他却暗中仍维持着与他那班特工人员的联系，仍然活动频繁，真是打也打不散了。张春桥知道后，给游雪涛下批示，警告他：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十分警惕！然而，游却改也难。似乎不搞特工，不与他的那些有狂热精神的弟兄们来往，他无法活。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能来非常措施了。他让徐景贤找游谈话，要游雪涛离开市革委机关，或去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或下放工厂，任其选一。

应该说，张春桥此举只是为了自己避险而采取的策略：游雪涛不在市里了，“2 4 4 小组”也不存在了，那还有谁能攻击他张春桥在搞特务机构呢？

游雪涛毕竟只是游雪涛，只是一个由浪漫文人自个儿转行、无师自通而从未受到过真正训练的特务，却不是一个象戴笠那样守纪律、能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更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因此，他不仅不能理解张春桥的韬晦意图，反而将张对他的举措视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打击。由此，他极为不满，在徐景贤找他谈话后，他立马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大发牢骚，认为是王洪文等人在害他，并表示了他的极大不满。

张春桥看了他的信后，也很生气，说：他这是给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了！

但，一时也没将游雪涛怎么样，只是宣布了将他下放工厂的决定。可是，不识时务却只有满腹牢骚的游雪涛，自视有功，拒不下去，称病在家。

不下去就不下去，养病就养病，也没人催他。游雪涛此时实在应借这空闲，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在哪儿出了毛病，而惹得张春桥对他做出了这么个决定？或者，也可以想一想今后应如何安安全全的生活，而再不去趟文革政治的污水了。

可是，他没有这样。相反，他仍然经常不断地找他那班前特工兄弟来谈话，也不断地发牢骚，讲话又常走火，不是同情陈伯达，就是开始说了对文革不满的话。而他这些话，又被他手下的一些弟兄传了出去，或揭发了去。

这一来，不要说张春桥，就是王洪文、徐景贤等造反派头头们都不能容忍他了。借 1971 年“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经张春桥批准，王洪文便派民兵将游雪涛抓了起来，“隔离审查”，关进了市民兵指挥部的监狱，一关三年多。直到 1975 年，经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等人同意，才将他放了出来，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仍要他下五七干校，发生活费。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游雪涛重新被捕，并被判刑 15 年，而且，前段王洪文关他的那三年多，算白关了，不能抵折刑期。因此，游雪涛为他的特务生涯，前后便共蹲了 18 年大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